

離經叛道與突破藩籬

——托爾斯泰的理性信仰觀及其當代闡釋

Rebelling against Orthodoxy and Breaking through the Barriers: Leo Tolstoy's Reasonable Faith and Its Contemporary Interpretation

金美玲

JIN Meiling

作者簡介

金美玲，中國人民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JIN Meiling, Lecture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Email: mljin@ruc.edu.cn

Abstract

Leo Tolstoy's religious exploration represents a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phenomenon infused with his distinctive personality. Tolstoy firmly believed in the doctrine of Christ, yet remained committed to subjecting traditional Christianity to the scrutiny of reason, aiming to demystify religion and establish a common rational foundation for the Kingdom of God on Earth. This notion ran contrary to traditional Christian theology, resulting in the renowned writer's eventual excommunication from the official church.

While delving into Tolstoy's rational faith, this article also spotlights the latest research on this topic within contemporary Russian academic circles. Contemporary Russian scholars have adopted a more open-minded approach when interpreting Tolstoy's rational faith. They argue that Tolstoy regarded faith as the bedrock of human existence, seeing it as a harmonious fusion of knowledge and practice that does not conflict with reason—a faith centered on nonviolent ethics. Tolstoy's theories on nonviolence, while often impractical within external institutional society, hold an irreplaceable significance in the spiritual journey of individuals with rational consciousness.

Keywords: Leo Tolstoy, reasonable faith, Christ, nonviolent ethics

自988年“羅斯受洗”以來，東正教對俄羅斯民族的世界觀、人生觀、思維和行為方式均帶來了深刻影響，為民族文化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動力和精神資源，塑造了俄羅斯人重視直覺、渴求絕對的精神氣質。與此同時，在教俗關係方面，俄羅斯東正教會表現出了明顯的依附性特徵，自建立之初，教會便與世俗權力密切結合，與俄羅斯中央集權同步發展。17世紀，牧首尼康的宗教改革引起了東正教會的分裂，導致俄羅斯形成了大規模的與官方教會對立的舊禮儀派，他們堅持舊的信仰、儀式和習慣，以諸種方式對抗教會。在19世紀的尼古拉一世時代，教育大臣烏瓦洛夫提出了以“東正教、專制制度、人民性”為口號的官方意識形態，壓制自由思想和開放討論，打壓社會改革者的努力，依附於沙皇勢力的高級神職人員濫用教會職權，從而加深了知識分子與官方教會之間的鴻溝。這一時期，出現了不少由教授、學者和學生組成的沙龍和私人小組，探討有神論與無神論的區別、俄羅斯未來何去何從等問題，發揮了強大的思想潛力。“真正獨立的宗教思想不是在教會內部產生的，而是在世俗界產生的，並且是在19世紀。世俗思想家所關心的卻是宗教問題，世俗文學家和哲學家首先開始對俄羅斯民族的宗教信仰進行反思，因此，俄羅斯的文學和哲學都具有濃厚的宗教色彩。”^①以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列斯科夫為代表的19世紀俄羅斯經典作家都在對生命的意義等終極問題的思考中融入了自己的宗教理解和宗教理想，對俄羅斯東正

* 本文為中國人民大學科學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成果，項目批准號：20XNF023。[This paper is supported by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 and the Research Funds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roject No.: 20XNF023.]

^① 張百春：《當代東正教神學思想》，上海：三聯書店，2000年，第2頁。[ZHANG Baichun, *Contemporary Orthodox Theological Thought* (Shanghai: SDX Joint publishing, 2000), 2.]

教精神的探索做出了獨特貢獻。

其中，托爾斯泰的宗教探索以其“轟轟烈烈”的形式和結果而尤為受人矚目。這位舉世聞名的文豪在發表了《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扛鼎之作後卻經歷了深刻的精神危機，在《懺悔錄》中全然否定了自己此前的生活和創作，並把餘下的三十年獻給了對生命意義與宗教真理的求索，不遺餘力地向大眾說教和佈道，然而結果卻是被官方教會革除教籍，其宗教思想也被後世思想家們廣泛詬病。^① 2000年出版的《列夫·托爾斯泰：贊成與反對——俄國思想家、研究者論列夫·托爾斯泰的個性與創作》及2002年出版的《俄羅斯思想家論列夫·托爾斯泰》^②便是對以往研究成果的合集。自蘇聯解體以來，俄羅斯學界對思想家托爾斯泰的研究既有對白銀時代宗教哲學家觀點的繼承，也有對後者的反撥。在回顧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當代俄羅斯學界致力於更加開放包容地看待托爾斯泰的宗教思想及其現實意義。

^① 藝術家托爾斯泰與思想家托爾斯泰的關係問題在其生前便受人重視，從米哈伊洛夫斯基的著名文章《列夫·托爾斯泰的左右手》（1875）開始，大部分批評家傾向於一分為二地看待這個問題，一方面高度評價托爾斯泰的文學創作，另一方面批判其宗教思想的平庸。白銀時代宗教哲學家（如梅列日科夫斯基、舍斯托夫、別爾嘉耶夫）、無產階級批評家（如普列漢諾夫、列寧）雖然從不同的立場出發，卻得出了相似的結論，即托爾斯泰的文學天賦和思想天賦是大相逕庭的，甚至相互對立的。英國著名思想家以賽亞·伯林也將托爾斯泰藝術觀與道德說教之間的關係解釋為二者的鬥爭。這樣的歷史評價令許多後人在接受托爾斯泰時產生了思維定勢，即托爾斯泰的宗教思想在其光輝燦爛的文學成就面前顯得黯然失色、幼稚淺薄，後人自動接受這種程式化的定論，以至於不願意去深入剖析其思想遺產的真諦。

^② 參見 К. Г. Исупов, сост., *Л. Н. Толстой: Pro et contra. Личност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Льва Толстого в оценке русских мыслителей и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ей* (СПб.: Русский христианско-гуманитарный институт, 2000); С. М. Романова, сост., *Русские мыслители о Льве Толстом* (Тула: Ясная Поляна, 2002)。[See K. G. Isupov, ed., *L. N. Tolstoy: Pro et contra. The Personality and the Works of Leo Tolstoy in the Assessment of Russian Thinkers and Researchers* (St. Petersburg: Russian Christian Humanitarian Institute Publ., 2000); С. М. Романова, ed., *Russian Thinkers about Leo Tolstoy* (Tula: Yasnaya Polyana, 2002).]

一、失去神秘性與神聖性的基督

從精神氣質上看，托爾斯泰是一個懷疑主義者和理性主義者，他在青年時期的日記中已然記下了一個宏大的夢想，即創立一種“剔除了盲目的信仰和神秘性的基督的宗教”，“不應許來生幸福、卻賜予現世幸福的實踐的宗教”，^①這也的確成為了他生命後三十年的主要任務。晚年托爾斯泰批判基督教義中一切不能為理性所解釋的神秘部分，否定神蹟，否定聖三位一體，否定末日審判，否定基督的神性。在他看來，一切超出人類理性範圍的基督的特性都是不能接受的：基督沒有起死回生，以此為人類贖罪；他不是上帝之子，不是救世主，也不是默禱時的神靈，只是一位道德水平極高的人類的先師。這一思想在他1870年代所作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已見端倪，托爾斯泰托書中栖身意大利小城的俄國畫家米哈伊洛夫之口，表達了他對基督的看法：當戈列尼謝夫認為米哈伊洛夫“把基督畫成一個人神，而不是神人”，且“把基督降到一個歷史人物的地位”時，畫家回答道：“我畫不出一個不是我心中的基督。”^②

托爾斯泰在晚年曾嘗試過做一個教會認可的虔誠的東正教徒，而官方教會的現狀和他本人強大的理性頭腦卻讓他無法心悅誠服地接受教會的領導。於是，他仔細研究一手材料，如希伯來文的《聖經》、希臘文的《新約》、陳述在《信經》和莫斯科大主教馬卡里的教條主義神學中的俄羅斯東正教的教條，他的目的在於分清基督的教誨和教會的教條。他繼而得出結論，教會的三位一體教義、基督奇

^① 【俄】托爾斯泰：《列夫·托爾斯泰文集》（第十七卷），陳馥等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年，第60頁。[L. N. Tolstoy, *Works of Leo Tolstoy*, vol. 17, trans. CHEN Fu, et al.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ress, 2013), 60.]

^② 【俄】托爾斯泰：《列夫·托爾斯泰文集》（第十卷），周揚等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年，第654頁。[L. N. Tolstoy, *Works of Leo Tolstoy*, vol. 10, trans. ZHOU Yang, et al.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ress, 2013), 654.]

蹟般的降生、贖罪和拯救的計劃的解釋經不起最簡單的邏輯檢驗，只是膚淺的語言遊戲。教條主義神學之所以能夠存在，只是因為它被教會賦予了權威。對於托爾斯泰來說，教會不是上帝的“代言人”，而是政權的附庸，是真正宗教信仰的敵人，它非但不能傳播宗教真理，而且還會影響人的道德進步。這種對教會與教會禮儀毫不客氣的指控在其晚期的文學作品，如《復活》《地獄的毀壞和重建》中屢見不鮮。

然而，托爾斯泰對基督的追隨是真誠的，他在自己的心靈深處接受了基督關於生命之路的教導。對他來說，基督的教義，尤其是《馬太福音》中的“登山寶訓”才是基督教的本質，即不發怒、不犯姦、不發誓、不以怨抱怨、不與任何人為敵以及當愛人如愛己。可以說，托爾斯泰要建構的是一個以基督的部分教義為主臬的道德化宗教。在他的後期作品中，有很多閱讀《福音書》、談論上帝的情節，很容易讓沒有宗教背景的世俗讀者理解為作家在宣揚基督教，是虔誠的基督教徒。但實際上，他筆下的人物對《福音書》的接受是選擇性的，是經過作家精心篩選的。

《復活》之所以被托爾斯泰如此命名，並非因為他相信聖子基督的復活。他故意將涅赫柳多夫誘姦卡秋莎的情節安排在基督復活節前夜，以諷刺這一節日的意義。涅赫柳多夫精神上的復活是在小說的結尾處通過他閱讀《福音書》的過程來完成的，但這種閱讀並非對《福音書》內容的全盤接受。涅赫柳多夫對自己所不能理解的地方有意跳過，這裏作家運用了被後來的俄國形式主義學派稱作“陌生化”的手法：

“凡為我的名，接待一個像這小孩子的”，這話是甚麼意思？在甚麼地方接待？甚麼叫做“為我的名”？他問自己，感到這些話沒有向他說明甚麼。“再者，為甚麼要把大磨石拴在這人的頸項上，而且要把他投進海

洋的深處？不，這有點不那麼對頭：講得不明確，不清楚。”他暗想，回憶他在一生當中有好幾次着手閱讀福音書，而這類不清楚的地方總是使得他無法讀下去。^①

托爾斯泰繼而寫道，讓涅赫柳多夫最為傾心的是《馬太福音》中的“登山寶訓”。他在這裏讀到了簡單明了而實際可行的誡命：不應當殺人動怒；不應當姦淫；不應當起誓；不應當以怨報怨，而應當在有人打你的右臉的時候，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不應當恨仇敵，打仇敵，而應當愛他們，幫助他們，為他們服務。一旦執行這些誡命，人類社會的全新結構就會建立起來，到那時不但所有暴力會被自動消滅，而且人類所能達到的最高幸福，即人間天國也可以得到實現。涅赫柳多夫想像着人們按這些箴規教育自己，按此生活，“於是一種很久沒有經歷過的歡樂抓住了他的心。這就像是他經過長久的疲勞和痛苦以後突然找到了安寧和自由一樣。”^②這正是托爾斯泰有意識篩選的福音書的內容，代表了托爾斯泰對基督教義的理解。

19世紀90年代，在和女兒一起拜訪了以東正教長老的修行而著名的奧普塔修道院後，托爾斯泰在自己的日記中對這次的拜訪做出了否定的評價，並構思了以修道院和修士生活為題材的《謝爾基神父》，小說在作家去世後才得以問世。曾經前程似錦的近衛騎兵連連長斯吉邦·卡薩茨基公爵在發現未婚妻曾是沙皇的情婦後毅然辭職，進了修道院，做了修士。他在修道院和隱修地中修行數年，成為聲望很高的長老。謝爾基神父儼然成為了世人敬仰的長老的典範，且果真治癒了一些病人。然而他的內心卻十分明白，所謂神蹟不過是一種巧合。前來向他求助的一個智力低下的年輕姑娘十分輕易地就讓曾經為抵

^① 【俄】托爾斯泰：《列夫·托爾斯泰文集》（第十一卷），汝龍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年，第549頁。[L. N. Tolstoy, *Works of Leo Tolstoy*, vol. 11, trans. RU Long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ress, 2013), 549.]

^② 同上，第554頁。

禦肉欲而不惜斷指的謝爾基神父走向了墮落，犯下了姦淫之罪。謝爾基神父帶着有罪的靈魂逃離了修道院和隱修室，走向了人間，在善良、羞怯、逆來順受的農婦巴申卡身上得到了真正的信仰的啟示。在故事的結尾，謝爾基神父雲遊各處，到西伯利亞一個農民的墾地上幹活，教孩子們讀書，照料生病的人，踐行起了托爾斯泰所認同的實用道德。可想而知，這一以神父為主題的作品令教會人士大為不滿，如曾著有《托爾斯泰與教會》一書的大主教沙霍夫斯科依（Иоанн Шаховской）指出，《謝爾基神父》“故事的輕率”在於“其整個內在情節缺乏的恰恰應該是最主要的東西：基督”，主人公在結尾處向一個普通農婦悔過，而非在基督面前，“復活是在沒有基督的情況下發生的，整個生活也是在沒有基督的情況下進行的。”^①作家田德里亞科夫甚至認為：“神性在這個偉大藝術家的創作中只是一個微薄的表層，在這一表層下則蘊藏着人性的基礎。我認為，在我們的文學中從來沒有出現過甚於托爾斯泰的唯物主義者。”^②實際上，托爾斯泰並非一個純粹的唯物主義者，即使他不能被稱作官方意義上的基督教徒，也應該被稱作信徒，因為他始終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他所能夠認可的信仰和“天國”。

二、信仰與理性的融合

去除了神秘性和神聖性的基督教信仰，還能否作為生命意義和無私之愛的基礎？在傳統神學視域下，這無疑是個謬誤。托爾斯泰主張

^① 參見吳澤霖：《托爾斯泰與中國古典文化思想》，北京：三聯書店，2017年，第207-208頁。[WU Zelin, *Tolstoy and Classical Chinese Thought*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2017), 207-208.]

^② В. Ф. Тендряков, “Божеское и человеческое Льва Толстого,” Л.Н.Толстой и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но-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мысль (Л.: Наука, 1979), 288. [V. F. Tendryakov, “Divine and Humanness of Leo Tolstoy,” in *L. N. Tolstoy and Russian Literary and Social Thought* (Leningrad: Science, 1979), 288.]

動用理性和意識來找到主宰生活的善的規律，並一生服從於此，讓自我得到完善。他把上帝代表的真理等同於意識所揭示的生活的理性規律，認為一個人只要意識到真正的生活規律就不會不去實現這一規律。俄羅斯白銀時代宗教哲學家們大多對托爾斯泰的宗教道德學說所表達的理性主義意識感到不滿，在他們看來，把拯救看作是一種認識，依賴於人的主觀能動性，這是理性主義的致命錯誤。

宗教哲學家弗蘭克（С.Л.Франк）對托爾斯泰理性與信仰的闡述則另闢蹊徑，他認為信仰和理性在托爾斯泰身上達成了妥協。在弗蘭克看來，在認識基督和上帝方面，托爾斯泰的確很少能滿足他們時代的大多數人，一方面，信徒會質疑托爾斯泰信仰的正確，認為他賦予了理性過多權利；另一方面，無神論者會批評他拒絕科學與文化，看不到人類理性的成就。而托爾斯泰的驚人之處正在於他融合理性和信仰這一行為所體現的完整性與堅定性。把理性看作魔鬼抑或上帝的時代均已逝去，在這兩個原則之間的鬥爭和矛盾是大部分人生活的常態。忠實於信仰的人其實也是承認理性和科學知識的，只是不希望這種知識跨越邊界而干涉信仰的事務；而崇拜科學的人也並不全盤否定信仰，只是把信仰看作個人的“私事”。因此人們的解決方案是既相信理性也保留信仰，只是將它們安置於大腦的不同地盤，因為對絕大多數人來說，信仰和理性的混淆會導致紊亂，尤其是在動蕩的時刻。因此，在世紀之交的俄國混亂而分裂的文化生活中，把信仰與理性融合起來、擁有統一的心靈和統一的宗教的托爾斯泰便顯得彌足珍貴，他就像一個舊約的先知、一位古希臘的智者、一座巋然不動的高山。^①這也解釋了為甚麼在那個沒有移動通信的時代，托爾斯泰的莊園會成為全世界有識之士希冀前去朝聖的聖地。

當代俄羅斯學界以更加包容的心態去理解托爾斯泰的“理性的

^① 參見【俄】弗蘭克：《悼念托爾斯泰》，張百春譯，《俄羅斯文藝》，2010年第3期，第81-86頁。[S. L. Frank, “In Memory of Leo Tolstoy,” trans. ZHANG Baichun, *Russian Literature and Art*, no.3(2010):81-86.]

信仰”。^① 在俄羅斯科學院哲學院士古謝因諾夫（А.А.Гусейнов）看來，托爾斯泰認為宗教與信仰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其區別在於：宗教是對世界之無限的一種外在態度，而信仰是這種態度的內在設定，是一種內在體驗。托爾斯泰將信仰重新定義為有意識的人賴以生存的根本，他將信仰看作對生命意義的認識，看作生命的力量和生活的動力。古謝因諾夫認為，要理解托爾斯泰對信仰的認識需要考慮以下兩點：首先，信仰與人的行為是相一致的，即知行當合一，因此要注意區分交織在個人的實際生活實踐中的信仰和關於信仰的空洞的思想。托爾斯泰自認為是真正的基督徒，他反對教會基督教的主要論據正是他認為教會基督教用《信經》替換了登山寶訓；其次，信仰不應當與理性相矛盾，作為生命力量的信仰是一種特殊的知識，是將人的理性推向邊界的知識，可以在理性認可的範圍內超出理性的界線。^② 另一位哲學家斯捷潘諾娃（Е.В.Степанова）試圖證明托爾斯泰的信仰在精神和內容層面的等值性，她得出如下三個結論：托爾斯泰把信仰理解為人類生存的基礎；這一信仰的內容是基督關於非暴力的教義；這樣

^① 提出該說法的論文有：А. А. Гусейнов, “Разумная вера Л.Н. Толстого,” in *Философия – мысль и поступок* (СПб.: СПбГУП, 2012), 540-561; “Философские наследие Толстого. Интервью Предрага Чичовачки,” *Философский журнал*, Т.11, no.2(2018):5-21; Е. В. Степанова, “Вера Льва Толстого: тождество состояния и содержан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о, религия, церковь в России и за рубежом*, Т.38, no. 2(2020):377-406; М.Л. Гельфонд, “‘Разумная вера’ и обоснование морали: уроки Толстого дл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этической теории,” *Этическая мысль*, Т.20, no.1(2020):82-97. [See А. А. Guseynov, “The Reasonable Faith of Leo Tolstoy,” in *Philosophy as Thought and Act* (St. Petersburg: Saint-Petersburg University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Publ., 2012), 540–561; “The Philosophical Legacy of Leo Tolstoy. An Interview with Predrag Cicovacki,” *The Philosophy Journal*, Vol. 11, no. 2(2018):5–21; E.V. Stepanova, “Leo Tolstoy’s Faith: The Equivalence of State of Mind and Content,” *State, Religion and Church*, Vol.38, no.2(2020):377-406; M. L. Gelfond, “‘Reasonable Faith’ and the Justification of Morality: Tolstoy’s Lessons for Modern Ethical Theory,” *Ethical Thought*, Vol. 20, no.1(2020):82-97.]

^② 參見 А. А. Гусейнов, “Философские наследие Толстого. Интервью Предрага Чичовачки,” 11。

的信仰被他貫徹到了日常生活實踐當中。該學者認為，托爾斯泰的信仰具有強烈的個人色彩，當代讀者應當尊重托爾斯泰個性化闡釋信仰的權利，“如果我們拒絕別人擁有這樣的權利，那麼也是拒絕自己擁有這樣的權利。”^①

托爾斯泰將信仰和理性相結合的結果是他的非暴力倫理學，這正是托爾斯泰本人的信仰。為了得到這一信仰，他深入研究了世界各地的經典人文思想，尤其是包括佛教、孔孟、老莊在內的東方思想，以期尋找到生發各大宗教之樹的共同種子。這是一種具有求道性質的理性研究，融合了托爾斯泰本人的理解，如在1886年改寫佛祖的故事時，他沒有直接引用佛教的教誨和教義，沒有試圖去考證佛祖具體的活動年代或詳細的事實，而是報着便於大眾接受這個宗教智慧的意圖去塑造佛祖的形象。對中國諸子的思想，托爾斯泰也是帶着自己的主觀視野分析揚棄，進行雜糅，以追求天下至真之理。他驚奇地發現，它們都有一個普遍的倫理規範，即“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而基督教義也正是對這一觀點的全面表達。托爾斯泰認為，不抵抗的愛是基督之愛的實質，《舊約》中雖然也反對惡與暴力，但為了善的目的，還保有它們的一席之地；而基督則認為暴力永遠也不能帶來善，因此絕對禁止暴力。相比摩西十誡而言，基督教義的新內容正是不以暴力抗惡，拒絕暴力和對惡的不抵抗是基督式愛的基石。不抵抗並不意味着與惡和解，在內心中向它屈服，而是一種特殊的鬥爭，即不接受、譴責、拒絕和反擊。托爾斯泰強調，按照基督的教導，地球上所有的行為都是對具有多種表現樣態的惡的反抗，有必要與惡作鬥爭。而暴力意味着殺人、外部強制、對某對象施加其所不願意接受的作用，按照基督學說，暴力是無法從根本上解決衝突的，也不能徹底鏟除惡，創造善，而根本的解決需要內心的作用，要用長期的善的增長來排擠惡，把衝突從外部轉移到人的內在精神領域。托爾斯泰認為理性和愛

^① Е.В. Степанова, “Вера Льва Толстого: тождество состояния и содержания,” 403.

是這種鬥爭的最佳手段。

古謝因諾夫認為，托爾斯泰思想的內在和諧和邏輯建構正是基於暴力與愛截然對立的事實。暴力的基礎是令周圍人和世界屈服於自己的利益，是強調“我”的意志，而非他人的意志，這是利己主義自我肯定的極端表現，而愛恰恰與暴力相反，是對“我”的意志的克制和對他人意志的尊重，是對他人的服務，其實質是對上帝旨意的追隨。那麼上帝的旨意為何？托爾斯泰認為，這個旨意是無法得知的，雖然人在理性認知框架內可以得出上帝是無限基礎的結論，卻無法得出這個基礎究竟是甚麼。因此，在對愛的實踐中可操作的只有第一步，即對“我”的意志的克制，這便要求人們拒絕暴力。拒絕暴力就意味着遵循愛的法則——這正是托爾斯泰思想架構的基石。^①作為托爾斯泰信仰的非暴力倫理學首先關心信徒自己的靈魂得救而非他人的善惡，要求把人的棄惡從善的積極努力從他人轉到自己內在的道德自我完善，這正是托爾斯泰為一個具有理性意識的人的靈魂與身體應當如何相處的問題提供的解決方案。

三、托爾斯泰理性信仰觀的當代關照

歷來學界對托爾斯泰非暴力倫理學的質疑來自兩方面，一是惡的來源問題，二是抗惡的手段問題。白銀時代哲學家大多認為，托爾斯泰沒有考慮到惡來自原初的、非理性的自由，且沒有對待外部的惡和內心的惡的不同手段。而托爾斯泰本人的假設是，上帝已經在這個世界上確立了人類應該遵循的善的法則。人性本善、無罪，一個人會作惡是出於對善的法則的無知。善本身是理性的，只有它才能帶來生活的平安和幸福，惡的發生正是因為缺乏對理性超出日常生活範疇的理解。因此，托爾斯泰極力揭露現實生活中的惡與謊言，呼籲人們在一

^① 參見 А. А. Гусейнов, “Философские наследие Толстого. Интервью Предрага Чичовачки,” 9-10.

切方面實現即刻的、終極的善。

托爾斯泰在晚年強烈抨擊國家的存在，認為國家是有組織的暴力機構，是對內的鎮壓機器和對外的戰爭武器。他反對國家政權、警察機構、司法組織等一切外在強制機關。在政論作品《天國在我們心中》裏，托爾斯泰探討了為甚麼國家、教會及任何外部力量都無法左右我們脆弱且充滿痛苦和意外的人的生命，在他看來，唯一能夠被人所完全掌控的，是能夠認識最高真理並能夠受到真理引導的理性意識。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一段時間裏，許多托爾斯泰主義的追隨者，包括知識分子、小職員、農民等，在俄國內外建立了諸多“托爾斯泰公社”，他們拒絕納稅和服兵役，主張自由、平等地生活在一個共同體中，踐行“托爾斯泰主義”。因此，很多學者在無政府主義的語境中探討托爾斯泰的學說，古謝因諾夫把它概括為“倫理無政府主義”。^①托爾斯泰區分了人的社會存在和道德存在：前者追求外在的順利、好處與利益，在這個層面上必然有一撥人管理另一撥人，而道德生活則相反，追求不以暴力抗惡、良心、愛和兄弟般的團結。在托爾斯泰看來，道德法則並非自然過程或社會過程的延續，它是獨立自主的，是人類存在的另一個維度。

那麼，這種在社會生活中看似缺乏合理性和現實性的學說是否為一種烏托邦？古謝因諾夫否定了這種觀點。他認為，首先，從柏拉圖筆下的亞特蘭蒂斯開始到當今的各種烏托邦，指的都是社會的形態，而托爾斯泰的學說面對的是個人生活。他的學說並非要回答該如何更好地建構社會，而是要回答個體該如何建構自己的生活。其次，烏托邦指的是不存在的、無法實現的想像。而托爾斯泰的學說是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實踐的學說，他呼籲人們去獲得真實的生活經驗，按照學說去組織自己的生活。托爾斯泰認為，人不應在幻想中期盼未來的上帝之國，在天空或彼岸中去尋找，而應該在自己的靈魂中，在自己的理性意識中去尋

^① А. А. Гусейнов, “Философские наследие Толстого. Интервью Предрага Чичовачки,” 13.

找它。托爾斯泰提供的是道德自我完善的方案，是對生命意義的新的理解，這並非烏托邦。他堅信不抵抗的真理是道德成長的新的最高度，人類已經向這個目標走了近兩千年，每一個意識到這個真理的人都應當踐行這個真理。的確，一個道德意義上的理想社會，取消人統治人的政治傳統，使人與人之間像兄弟般團結，在當今社會學的角度看是不可能的，社會還會按既有的軌道向前發展，而托爾斯泰的非暴力學說雖然在制度和統治原則中並不現實，但在個體的精神世界中，應當被看作時代的普遍理想。道德自我完善的意義並不在於改善社會或其外在的建構，而在於重塑一個理性的個體和其內心的精神生活。

這同時也可以證明托爾斯泰並不贊同消極的無為主義，他不是宣揚為了和上帝結合而避世，而是要改變人在世界中生存的方式。托爾斯泰認為生命意義在於人對靈魂的關照，而不是對肉體的關照，因為肉體讓人與人分離，而靈魂讓人與人相結合。但他也清醒地認識到，靈魂不存在於肉體之外，肉體具有自己的時空維度。對靈魂的關照，即建構心中的上帝之國，意味着身體成為靈魂的武器，而不是與之相反。“托爾斯泰在獲得自己的信仰後所秉承的生活方式，如他對暴力的機構和喉舌進行的鬥爭，對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徹底改變，其中包括體力勞動，以及孜孜不倦地研究不抵抗理論等，所有的一切令我們聯想到徒手擊殺雄獅的參孫，而不是回歸自我的印度瑜伽。”

① 托爾斯泰堅信非暴力的真理會為自己打通道路，這啟發了甘地、馬丁·路德·金、阿爾貝特·施韋澤等社會活動家。雖然晚年托爾斯泰的努力與付出並沒有徹底改變世界的現狀，但無疑有助於世界向更好的方向發展，有助於人們將非暴力看作人們共同生活的基礎，這樣的呼聲在當今世界顯得尤為迫切和珍貴。

的確，托爾斯泰的偉大“不僅在於其文學創作的規模和成就，風格和影響，更在於他身體力行的存在方式和作用於現實的思想力

① А. А. Гусейнов, “Философские наследие Толстого. Интервью Предрага Чичовачки,” 17.

量。”^① 大文豪的最後出走，並非因懷疑自己的信仰，而是為了徹底擺脫亞斯娜亞·波利亞納莊園主人、私有財產所有者的身份，擺脫對其追求表示不解和反對的家人的禁錮，從而達到真正的知行合一。個人的理想境界與生活現實之間的巨大差異造成了托爾斯泰精神上的痛苦。可以說，托爾斯泰並非傳統的理論意義上的思想家或哲學家，而是屬於用自己的學說和實踐為人們帶來對生活的全新理解的人生導師。他敢於突破東正教神學的界線，渴望為全人類拓展精神發展的廣闊空間，體現出其超越宗教、民族、文化和意識形態等藩籬的博大胸懷和對未來世界中人的精神困境的敏銳預感。

^① 劉文飛：《俄國文學的有機構成》，北京：東方出版社，2014年，第342頁。
[LIU Wenfei, *The Organic Composition of Russian Literature* (Beijing: Oriental Press, 2014), 342.]

參考文獻

西文文獻 [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

- Гусейнов, А. А. *Философия – мысль и поступок*. СПб.: СПбГУП, 2012.
- _____. “Философские наследие Толстого. Интервью Предрага Чичовачки.” *Философский журнал*, Т.11, №2(2018):5-21.
- Гельфонд, М. Л. “‘Разумная вера’ и обоснование морали: уроки Толстого дл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этической теории.” *Этическая мысль*, Т.20, №1(2020):82-97.
- Исупов, К.Г. (сост.) *Л.Н.Толстой: Pro et contra. Личност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Льва Толстого в оценке русских мыслителей и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ей*. СПб.: Русский христианско-гуманитарный институт, 2000.
- Романова, С. М. (сост.) *Русские мыслители о Льве Толстом*. Тула:Ясная Поляна, 2002.
- Степанова, Е. В. “Вера Льва Толстого: тождество состояния и содержан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о, религия, церковь в России и за рубежом*, Т.38, № 2(2020):377-406.
- Тендряков, В.Ф. *Л.Н.Толстой и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но – 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мысль*. Л.: Наука,1979.

中文文獻 [Works in Chinese]

- 【俄】弗蘭克：《悼念托爾斯泰》，張百春譯，《俄羅斯文藝》，2010年第3期，第81-86頁。[Frank, S. L. “In Memory of Leo Tolstoy.” Translated by ZHANG Baichun. *Russian Literature and Art*, no.3(2010):81-86.]
- 劉文飛：《俄國文學的有機構成》，北京：東方出版社，2014年。[LIU Wenfei. *The Organic Composition of Russian Literature*. Beijing: Oriental Press, 2014.]
- 【俄】托爾斯泰：《列夫·托爾斯泰文集》（第十七卷），陳馥等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年。[Tolstoy, L. N. *Works of Leo Tolstoy*, vol. 17. Translated by CHEN Fu, et al.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ress, 2013.]
- 【俄】托爾斯泰：《列夫·托爾斯泰文集》（第十卷），周揚等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年。[Tolstoy, L. N. *Works of Leo Tolstoy*, vol. 10. Translated by ZHOU Yang, et al.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ress, 2013.]
- 【俄】托爾斯泰：《列夫·托爾斯泰文集》（第十一卷），汝龍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年。[Tolstoy, L. N. *Works of Leo Tolstoy*, vol. 11. Translated by

Ru Long.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ress, 2013.]

吳澤霖：《托爾斯泰與中國古典文化思想》，北京：三聯書店，2017 年。[WU

Zelin. *Tolstoy and Classical Chinese Thought*.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2017.]

張百春：《當代東正教神學思想》，上海：三聯書店，2000 年。[ZHANG Baichun.

Contemporary Orthodox Theological Thought. Shanghai: SDX Joint publishing, 2000.]